

邓小平青年时期的宣传工作

邓涛



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邓小平

1926年6月，时年22岁的邓小平按照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要求，填写《党员批评计划案》。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他填写了“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曾任《赤光》杂志编辑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字希贤）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州岳池县姚坪里，1918年考入广安县中学，翌年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邓小平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他还不满20岁。

1923年6月11日，邓小平到了巴黎。他一边做杂工，一边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杂志（1922年8月11日创刊）的编辑工作。邓小平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并用本名还有化名发表文章。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雅，他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少年》杂志社即中共旅欧机关驻地，在巴黎十三区的戈德弗鲁瓦街17号一家小旅馆内。

《少年》杂志在1924年2月1日改名为《赤光》（半月刊）正式出版。创刊号上发表的《赤光的宣言》写道：“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我们要以科学的方法，综合而条理出各种事实来证明我们的主张无误。本此，便是我们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的始意，同时也是《赤光》的新使命了。”

以曾琦和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以《先声》周报为阵地，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国共合作。1924年9月、10月间，邓小平因患伤寒住院治疗一个月，出院后又到疗养院疗养一个月。他病中撰写了批驳中国青年党的评论《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发在《赤光》第十八期上。文中揭露了青年党捏造新闻，欺骗广大旅法华人，“使他们都来笑骂革命党人”的无耻行径。同时严正指出：利用《先声》周报散布捏造“新闻”，是“国家主义”者的重要手法，因为在他们看来，“新闻我能时常更改或假造，以能使人愤怒为目标”。

1925年1月，署名“希贤”的文章《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和《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刊登在《赤光》（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前一篇抨击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企图。文中说：“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美，想一方面改变

包有四万万居民的大国为殖民地；他方面从苏俄势力中把中国拔出来，再用经济封锁来从经济上扑灭那正在充分发展的地方（苏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要空前地大叫：‘勿犯中国。’”第二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为着新闻而读《先声》的人，应知反革命派就在迎合你们的需要，捏造新闻，来宣传你们欺骗你们呢！”

《赤光》杂志大部分在欧洲发行，读者主要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者、勤工俭学的学生以及华工；少数发行于国内和加拿大、古巴等国家。

“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

1926年初邓小平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他在当时写的自传中说道：“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

1926年6月16日邓小平按照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要求，填写《党员批评计划案》。关于“党员问题”一栏填写：“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守纪律、对党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应狄楚青之邀，南下上海进入《时报》馆，主编外埠新闻的同时，亦用“秋星阁”“钊影楼”“天笑”等笔名创作小说和翻译日文小说。后来随着投稿量的增多，很多优秀的文艺性稿件弃之不用甚为可惜，包天笑先生向狄楚青建议：在新闻和论说之外，另开一栏目，专门刊登小品文、

讨论各种问题。”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填写“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邓小平1927年2月回国，到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中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同年7月到汉口，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为了摆脱敌人的白色恐怖，他随中央机关从汉口搬到武昌，又从武昌搬回汉口，经常转移，机智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此后，邓小平开始改用“邓小平”这个名字。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9月底或10月初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期间，邓小平协助留在国内的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1929年他赴广西首次独立地领导一个地区的工作，化名邓斌、领导创办《右江日报》和《士兵之友》等报刊。

主编《红星》报

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先后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领导创办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会昌县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

1933年5月在王稼祥、贺昌等人的提议下，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当年7月至1934年底邓小平被调离、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期间他共主编《红

星》报70多期。该报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

在瑞金郊外下肖村西边的总政治部宣传部，邓小平带领几名工作人员，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他以化名或不署名的形式撰写各类文稿；采用社论、署名文章及开辟“党的生活”“支部通讯”“革命战争”等专栏形式，宣传报道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红军总部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开辟“捷报”“前线通讯”“前方电讯”“最后电讯”等专栏，及时报道红军的战况和胜利消息；开辟“铁锤”“自我批评”等专栏。

1933年8月6日，邓小平将《红星》报改版，恢复为四开四版的铅印形式、重新排序号，出版第一期。第二期报纸，刊发毛泽东用“子任”笔名撰写的《吉安占领》。并刊载《优待投稿同志》和《征求照相机及照相材料》两则启事。从10月22日开始，不定期出版《红星》报副刊，主要报道红军的工作及经验，编译苏联红军政治工作的成功案例。到1933年12月31日《红星》报出了第22期，发行量达到1.7万余份。

1934年1月28日，第26期报纸出版，刊发消息《伟大的一天》，报道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盛况。4月8日第36期《红星》报，刊发社论《五一劳动节的工作》。5月25日第44期刊登陈毅的文章《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潮流》，介绍永丰游击小组的战斗经验。8月1日第56期，刊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八一节给全中国工农红军的命令》。8月20日第60期，刊登周恩来撰写的社论《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8月25日《红星》报出了第61期。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向湘西进发，开始战略转移。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被编在第二野战纵队（亦称红章纵队），该纵队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门、共青团等单位组成。10月20日在行军途中，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油印版第一期出版，刊发政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作》。报纸每期印700至800份，发到连队。

《红星》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张影响较大的报纸，也是长征途中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唯一报纸，担负着党报与军报的双重任务。11月25日出了油印版第五期。27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为减轻辎重，邓小平率《红星》报全体同志扔掉笨重的油印机，靠手动油印机继续出版报纸。12月上旬，《红星》报油印版第六期出版。刊发中共中央《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和《消灭掉队落伍的现象》等重要稿件。在革命战争年代，“学习优秀，党性强”；邓小平虽然话不多，但善写，他的总结报告在党内有口皆碑。毛泽东特别喜欢看他的报告，说看了小平的报告就像夏天吃了冰淇淋一样凉爽。

（作者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文人逸事

郭沫若写校歌

周惠斌

1926年2月，郭沫若被国立广东大学聘为文科学长兼史学系教授。不久，广东大学拟改名为中山大学，郭沫若受筹委会委托，撰写了一首荡气回肠的校歌：“浩然正气此长存，霹雳一声天下惊，叱咤风云卷大陆，倡导三民主义首民族，此乃吾校之衣钵，此乃吾校之衣钵。白日青天满地红，新兴文化作先锋，匪行之艰知之艰，倡导三民主义重民权，此乃吾校之真铨，此乃吾校之真铨。中原之中山大，扶植桃李满天下，博审慎明还笃行，倡导三民主义济民生，此乃吾校之光采，此乃吾校之光采。”歌词分三节，七言成句，欢快豪迈，深刻阐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和学校的办学理念。后来，该校音乐教员李耀辉为歌词谱了曲。4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郭沫若创作的中山大学校歌歌词。

1958年9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

的郭沫若兼职担任校长。学校开学前，郭沫若创作了校歌《永恒的东风》，并广泛征求意见。经周恩来审定，郭沫若最后作了修改并确定了歌词：“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科学的高峰在不断创造，高峰要高到无穷，红旗要红过九重。我们是中国的好儿女，要刻苦锻炼，辛勤劳动，在党的温暖抚育、坚强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先锋。又红又专，理实交融，团结互助，活泼英勇，永远向人民学习，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

歌词以报国为底色、以科学为目标、以学习为路径，折射出鲜明的时代印记，反映了中国科大的办学追求和理想信念，凸显了丰厚深邃的精神内核。两天后，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应郭沫若之请为校歌谱曲。9月20日，中国科大举办成立暨开学典礼，全校1500多名师生合唱校歌，歌声嘹亮，荡漾心田，鼓舞了他们投身科教报国、攀登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马寅初的真性情

王剑

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马寅初针砭时弊、嫉恶如仇的勇气和胆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0年11月，马寅初应黄炎培的邀请到重庆实验剧院发表演讲，他开讲即说：“如今国难当头，人民大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浴血奋战；但是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抗战，后方和平和满贯。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

因马寅初经常在演讲、文章、提案中公开揭露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由此罹祸，被关进了上饶集中营。社会各界为了营救马寅初，自发组织起来，要在重庆为他举办六十寿辰祝寿会，各阶层共数百人到场祝寿。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送来装裱好的大幅贺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伴读支床有龟。”新华社则将一副对联写在一大红绸缎上：“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重庆大学还专门集资为他修建“寅初亭”，冯玉祥亲自题写匾额。

生活中的马寅初，风趣幽默。有一次，他去澡堂洗澡，服务生见他穿的背心有洞，忍不住问道：“马先生是大教授，还穿这么破旧的衣服？”马寅初笑着说：“背心上有破洞，碍什么事，穿着凉快啊！”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有人给他泼冷水，他不失风趣地说：“泼冷水是不好的，但对我倒很有好处的。我最不怕的是冷水，因为我洗惯了冷水澡，已经洗了五十年了！”

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马寅初总能做到宠辱不惊、淡然处之。1960年3月，马寅初被免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儿子回家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只是轻轻地“噢”了一声，便不再言语。1979年9月，北京大学召开大会，为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并对他进行高度评价。此时，马寅初已经97岁高龄了。当儿子回来告诉他这一喜讯时，他又是心不在焉地“噢”了一声，不置一词，依旧闭目养神，好像这件事与他没多大关系。

梅兰芳和卓别林

王吴军

我国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曾经在香港非常认真地观看了7遍卓别林主演的电影《大独裁者》，大为佩服。

后来，卓别林在香港见到梅兰芳的时候，两位大师惺惺相惜，相处得非常愉快，卓别林非常真挚地把自己设计的一种火柴送给了梅兰芳一盒，留作纪念。

卓别林不仅是一个幽默的喜剧大师，也是一个很富有智慧的人，他曾经设计过一种别致的火柴。

1940年初，卓别林在他主演的电影《大独裁者》即将上映的时候，忽然来了兴致，就自己动手设计了一种富有情趣的火柴。这种火柴的盒子是扁平的，用订书机装订了起来。火柴盒的一面印着《大独裁者》主人公兴

格尔（其实是指希特勒）抱着地球仪玩弄的情景，显示出一副贪婪的模样。火柴盒的另一面是英文字母的《大独裁者》的电影片名。打开火柴盒，里面是制成炸弹形状的火柴。

卓别林设计的这种火柴使用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擦火柴的地方恰恰是兴格尔的屁股，卓别林说：“我这样设计的意思是在时刻警告一切热衷于战争的霸权主义者：玩火者必然自焚。”

这样的设计别出心裁，由此也可以看出，卓别林是一位非常爱好世界和平的喜剧大师。

卓别林把自己设计的这种火柴赠送给梅兰芳，表达了自己热切期望世界和平的心声，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

狄超白创办《溧阳日报》

周星

1932年2月，中共溧阳特别支部顺利改建完毕后，为了更有效地开展革命活动，支部决定创办一份党报。支部书记狄超白任主编。

为筹集办报经费，社长沈兰芝毫不犹豫慷慨解囊，花费200多元从苏州购进一批美国进口的无线电元件，组装成一台五灯收音机。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这台收音机为他们打开了获取外界动态的大门。

1932年2月20日，《溧阳日报》创刊。这是一张四开排老三号字的地方报纸，主要以发表记录新闻为主，由竞华印刷厂承印，印数达800份。狄超白以笔为剑，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的真相，毫不留情地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以及勾结日本的罪恶行径，号召民众抵制日货、团结抗日。他详细地阐述了抵制日货的重要性和方法，鼓励民众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日本侵略

者的愤怒和反抗。在他的号召下，溧阳的民众纷纷行动起来，抵制日货的浪潮迅速席卷了整个城市。狄超白还采写了《婴粟堂的调查》《监狱视察记》等文章，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对弱势群体的漠视和虐待以及监狱中的种种不公和虐待囚犯的行为，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人们纷纷被狄超白的勇气和正义所感动，对他的文章赞不绝口。

国民党反动派看到《溧阳日报》的影响后大吃一惊，立刻派人破坏了报社组织，并抓到了溧阳党组织线索。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迅速给溧阳县政府下令，指名逮捕狄超白等人。3月中旬，狄超白不幸被捕，《溧阳日报》也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查封。这张仅仅办了7期的党报，在反动统治的压迫下被迫停刊，但它所散发的光芒与影响力却从未消逝。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溧阳县县委恢复创办了《溧阳日报》，并邀请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为报纸题写了报头。

包天笑首创“余兴”

郝增

谈及报纸副刊，要追溯到清朝末年中国报业的开端。

中国创办最早的华文报纸，是在上海由英国人出资的《申报》和美国人出资的《新闻报》。当时印刷用的新闻纸张，是白报纸单面印刷，其版面仅有一大张。刊载的大多是上谕、宫门抄和本埠新闻，此外就是各类洋行的广告。

1898年5月汪康年、汪诒年兄弟在上海创办了《中外日报》，成为中国开办的第一家报纸，创造性地实行了双面印刷，“版面分栏、新闻分类”的编辑方法，日出对开4版，使报纸的版式和容量前进了一大步。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均不刊载诗歌、小说之类的文艺作品。1904年由康有为、梁启超参股，狄楚青任总经理的《时

报》在上海创刊，首开刊登诗话、笔记、杂文、小说等文艺性作品，被誉为报业的创举。如狄楚青所著的《平等阁笔记》《平等阁诗话》，就是先在《时报》上刊载，后由书局出版发行的。

但《时报》上刊载的小说、诗话、笔记等体裁的作品，都是排在论说、新闻之后，并没有一个系统规范的版面。1906年，包天笑先生从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监督之职上卸任，应狄楚青之邀，南下上海进入《时报》馆，主编外埠新闻的同时，亦用“秋星阁”“钊影楼”“天笑”等笔名创作小说和翻译日文小说。后来随着投稿量的增多，很多优秀的文艺性稿件弃之不用甚为可惜，包天笑先生向狄楚青建议：在新闻和论说之外，另开一栏目，专门刊登小品文、

趣味轶事、诗词诗话、漫画幽默、戏曲评论等消遣性文字。此建议得到了狄楚青及报馆同仁的一致赞同，经狄楚青首肯此栏目遂取名“余兴”。

“余兴”一出，立刻吸引了不少文人学子，大家纷纷投稿。“余兴”一时五光十彩，落英缤纷，矜奇逗巧之文、讽刺俚曲歌词、游戏谈谐短章可谓层出不穷，赢得了各界读者的好评。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范烟桥、周瘦鹃、毕倚虹等名家，都是这一时期“余兴”上发展起来的。

当时的报纸，除小说作品外，所刊登的文章均属消遣性质，皆不付稿酬，完全出于作者的一厢情愿。但《时报》的编辑，体谅作者的甘苦，便给予作者一些购书优待券，可以定期到《时报》馆开办的“有正书局”里选购图书。

一花引来万花开，随后各报亦纷

纷效仿。《申报》开辟了副刊“自由谈”，我们所熟悉的鲁迅先生的许多杂文名篇，就是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新闻报》自不甘落后，副刊名为“快活林”。当时比较知名的副刊还有邵力子先生主笔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等等；《神州日报》在余大雄接手时，销路仅有几百份，他便别出心裁，又创办了一份《神州日报》的附报，三日出一期，取名《晶报》，属于副刊性质。专门刊登社会新闻、名人轶事，凡大报不愿或不敢登载的一些涉及要人隐私的文稿，它可以大胆地刊登出来，故而特别畅销。当年首倡副刊“余兴”的包天笑先生晚年的回忆录——《钊影楼回忆录》，就是在香港的《晶报》上连载后，由大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